

张 伯 简

张伯简，字稚青，别名红鸿（或洪鸿），白族，1898年出生于云南省剑川县金华镇桥头街。父亲张鹤裳，清末的秀才，曾在剑川高等小学任教。他为人耿直正派，性格倔强。年轻时，曾邀约一些正直人士，冲破剑川州官的封锁，到丽江府去控告贪赃枉法、压榨百姓的州官。州官虽被告倒了，但他自己也遭诬陷，受尽了折磨，最后被押解回乡。父亲这种不畏权贵、敢于斗争的精神，给幼年的张伯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伯简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张伯简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同时也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好学生。目睹军阀割据的旧中国的遍地疮痍、民不聊生的现实，他为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痛心疾首，在作文中常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感。

1917年，张伯简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教小学。1918年，他辞去教师的职务，离别了景色宜人的故乡，到了风云际会的广州。经亲友介绍在驻粤滇军的医院里当军需。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各界人民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更激起了这位来自西南边疆的白族青年的爱国热情，他对广州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热忱。在他的日记《南越游记——稚青日记》中写道：

“晨起，看新闻纸数张，有留英学界《敬告国人书》，意重语长，言之痛心。”

“今日广东学界中学以上，经医院往军政府请愿取消青岛各条件，一时男女学生共千余，可谓热心国事。”

“日来广东以政党意见不调，各方戒严，吁，和会失败，犹尚内争不已，中国前途，可堪问耶？！”

在191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他记述道：“乘车归，沿途见贴有不买日货之标语，知昨夜公愤，提倡抵制日货。”为了以实际行动置身于“抵制日货”的反帝洪流中，他“购一布帽”，毅然将自己原有的草帽（日货）扔掉。

在广州，张伯简还如饥似渴地学习，抓紧一切时间阅读书籍报刊，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炎热的夏天，张伯简手不释卷地阅读张居正和史可法等人的著作，特别是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以及《爱国报》、《新潮》等进步书刊。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看《张江陵尺牍》数页”，“看《史文忠尺牍》一本，悲歌慷慨，令人发指！”“早起，看《孙文学说》数十页，开人胸臆。早饭后理事毕，仍继续看书至午热极欲就枕时。”通过学习，他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在6月13日和7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风潮甚烈，广东学界又因青岛问题全体罢课，军政府亦表同情。然皆纸上谈兵，殊可叹矣！”“日来广东以外交失败、内政纷扰而工商罢市！”在日记中，他不仅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剖析，而且深感“将来中国尚多有事，锻炼自身亦有受用”，因而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提出了新的要求：“试问生来二十年，日见马齿加长，而一切社会学问一无所知，志不立，过不改……根基未固，当此二十世纪中尚

有我立脚否乎？！

“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当时国内贫苦学生兴起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为了寻求革命的道路，学习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直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张伯简毅然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冬，张伯简以“理财本非所能”为由，辞去滇军军需职务，离开广州，告别祖国，远涉重洋，到了巴黎。1920年初，在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10月进入博利午工业实习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做工。

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元气大伤，急待恢复，缺乏劳动力，看来是做工的好机会。但由于勤工俭学生不懂技术，劳力不强，再加上法国本身失业求职的人也很多，因此勤工学生要找到工作并不容易。到1920年止，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已有一千六百多人，而当时有工作的只有四百多人。因此部分同学感到“勤工”既难，“俭学”更不可能，一时勤工俭学运动呈现沉闷局面。在学生中，对“能不能”与“要不要”继续勤工俭学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有少数学生提出了向国内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权利的“求学运动”。

为了坚持勤工俭学，1921年2月，张伯简与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等提出了“互助、劳动、改造社会”的口号，成立了“劳动学会”，后来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他们自筹经费印发意见书与声明，号召大家继续坚持勤工俭学，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要求大家不择条件，有工作就做，艰苦支持，不要影响勤工俭学。同时，他

们向“华法教育协会”写信，详细陈述勤工俭学的情况，要求他们向法国提出交涉：1.在各工业学校开办特别预备班，吸收勤工俭学生学法文；不在各工厂开设特别学习部，吸收勤工俭学生当学徒。这封信在法国和国内的许多报刊上同时发表，以向社会呼吁。为了从思想上澄清当时对勤工俭学的一些错误言论，提高大家对勤工俭学的认识，1921年10月，张伯简曾以“留法工人张伯简”的署名，在《时事新报》的《柏林通讯》栏目中，发表了《勤工俭学变迁略史》一文，文章一开头即阐述了勤工俭学的意义：“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流而生，为中国数千年文化运动激荡而成，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动。他主要的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也就是改革中国黑暗地狱之初步。”同时阐明了于当年3月28日正式成立的“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土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

由于艰苦的生活、刻苦的学习和繁重的劳动，使张伯简的身体愈来愈坏。周围的同志关心他，并为他筹集了一笔旅费，要他去德国、奥地利作一趟旅行，借此使身心得到休息，健康得到恢复。他接受了同志们的劝告，于1921年夏，到德、奥两国度假。在这次去德奥前，他在写给国内亲人的信中说：“昨乃向工厂请假避暑，惟不愿以此时间金钱花之于风月，拟乘此机会旅行德奥两国，一观战后军国主义之消长与国际和平会议后所造出强权跋扈之各国对于战败国家所留之罪恶，及战败国民负担加重以来之反声，顺便参观两国科学界之真精神，与德国革命后劳工运动之趋势，藉以略抒胸襟。”在德奥，他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学校，“所费不多，然

知识上称是得无数底教训。”

在德奥作短期的休假与考察后，张伯简又回到巴黎，继续“勤工俭学”，过着艰苦而紧张的工读生活。同年秋季，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的带领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张伯简在这次斗争中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

1921年冬，张伯简转赴德国，在柏林继续勤工俭学。

在近两年的勤工俭学中，张伯简接触到国外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阶级矛盾激化的新形势，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他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922年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在《我对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一点回忆》中说：“1922年我赴德后乃在柏林成立一个支部，人数渐渐加多。张伯简、熊雄，都是最早的分子。”

入党后，张伯简积极参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欧洲少年共产党”的活动。1922年赵世炎在给李立三、陈公培的信中说：“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璋、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告成。”通过在法国和德国同志的一致努力，1922年6月3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正式成立。赵世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周恩来、张伯简分别被选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因张伯简在德国是旅德支部成员，后改选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就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的这一天（1922年6月3

日)张伯简在德国衣纳(耶拿)参加了德国少年共产党大会,参加了约有一万五千人的示威游行。6月5日上午,在衣纳大市场的国际宣讲大会上,张伯简发表了演说,报告中国少年对于共产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的近况。

在这前后,张伯简与谢寿康还被介绍到德国其他的一些城市去演说,并受到热烈欢迎。对此赵世炎曾给予高度评价。赵世炎在给国内同志写信时说:“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C.P.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他们去了好几处,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赵世炎还称赞张伯简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并力荐张伯简同谢寿康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他在1922年上半年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寿康与伯简去俄事……我们盼望国内能答应,即时委命……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

1922年冬,张伯简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4年夏,张伯简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五年来,张伯简由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青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回国后,他更是全力投身于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他在上海给亲属的信中说:“伯简离家七年”,“本拟归省,……不料事与心违,甫至上海,即为团体工作羁滞,责任所在,义不容辞,……伯简现在和将来,都要从事民族革命工作,生活朝东暮西,实无法顾及家庭。”

在上海,张伯简一面从事工人运动,一面应瞿秋白的邀

请，担任上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来往于京汉铁路线的一些城镇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4年9月，青年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加入江浙皖区委为正式委员，张伯简、俞松秀为候补委员。以后，张伯简又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党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的送稿员，在党的地下印刷所从事艰险的出版工作。因为当时党组织还没有自己经营的印刷机构，承印党的出版物是一家私营的明星印刷所。

1924年11月前后，张伯简担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在此期间，他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政治生活》周刊，并担任该刊的编辑。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青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团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张伯简与恽代英、任弼时、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七人组成“大会议案准备委员会”，参加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团中央局还决定由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任弼时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的草案。大会开幕后，张伯简和陈独秀、张太雷等被大会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并被推为大会秘书与组织问题委员会、无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在这次大会上，张伯简被选为共青团（这次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并代理团中央农工部主任兼《平民之友》的编辑。

这时，张伯简还参加了由中央机关和上海地委工作人员组成的公共支部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张伯简被派往上海总工会工作，参加了沪西小沙渡各纱厂工人的战斗行列。在工作中，他与纱厂女工、共产党员薛映华结成革

命伴侣，在上海结婚。此时，他还在党的最早的通讯社“国民通讯社”担任领导工作，报导全国各地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

张伯简除了从事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之外，在理论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他根据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译制了一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社会发展史表解《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说明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结构，还编写了《社会进化简史》一书。这两本译著都是我党早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1925年曾由上海书店套色石印出版，1930年至1933年间又由北方人民出版社以“晓旭”的署名出版。此书在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革命书刊的目录中，曾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列为禁书。《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11月由广州国光印刷厂印刷，国光书店发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中央苏区中央出版局曾重印过这本书。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将此书作为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推荐书目之一。

1925年秋，张伯简受党的指派，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同时还担任党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之路》的编辑出版工作。

1926年，我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张伯简被聘为讲习所教员。《中国农民》杂志中刊登的《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中记载：“所长聘请毛泽东同志担任”，“教员拟请……张伯简、谭植

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曾被农讲所列为教员课外理论研究的参考书。

在1925年6月开始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张伯简作为党中央罢工委员会书记，与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由于劳累过度，张伯简早已积劳形成的肺病发作，党组织急忙将他送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珠江颐养园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1926年8月病逝，时年二十八岁。

（徐继涛整理）

赵 琴 仙

一

赵琴仙，字友恒，1907年生于昆明。她的父亲在清朝光绪年间中过举，辛亥革命后在政府机关当职员，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日常生活，家境贫苦。姐妹三人，她是老三。她七岁入女师附小读书，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在她十岁那年，父亲不幸死去，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母亲和两个姐姐靠帮别人做手工维持生活。后来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母亲带着她和军阀唐继尧部下的一个反动军官结婚。她秉性温和，待人亲切，对有不幸遭遇的同学能寄以同情，是同学的贴心人。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从不妥协迁就。1921年，她高小毕业后考入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一直到1925年。后来，由于与继父无法相处，她搬进学校住宿。

赵琴仙是一个刻苦好学，活泼爽朗的女青年，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当班上开始组织读书会时，她就积极参加了这个业余学习组织，1925年在即将毕业的岁月，又直接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

“五卅”惨案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6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等各地广大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

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时，在昆明也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各校学生组织了宣传队向各界群众进行宣传，并组织罢工、罢课、罢市，抵制仇货，以示反抗。赵琴仙是女师领导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带头响应学联的号召，组织援工后援会，和进步同学开会研讨，排演节目，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游行中她常领导大家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在热闹的十字路口进行街头宣传。他们编演“五卅惨案”的节目，宣传上海学生支援工人的反帝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压迫、枪杀我国人民的罪行。

二

1924年冬，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李国柱为首的云南进步青年组织了“青年努力会”。这个组织的总会设在省立一中，其他学校设支会。总会由李国柱负责，女师支会由吴澄负责，吴澄介绍赵琴仙参加了青年努力会的组织，成为青年努力会在女师的骨干，团结进步青年，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

1926年1月，赵琴仙在女师毕业后，留该校图书馆工作，并在女师附小一校兼教音乐课。她上课时耐心地教学生，下课后又带着同学们游玩、讲故事，十分关怀同学的健康成长，同学们都十分爱戴她。

她自幼就爱读一些有意义的课外书，如《少年漂泊者》之类。加入李国柱领导的“云南青年努力会”后，又常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进步很快，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在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1926年春吴澄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团组织的教育下，她的思想

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就在这一年夏天，在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该校政治教官王德三负责，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所在地——广州大沙头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学员对象是云南进步组织“新滇社”成员和云南地下党送来的党团员。上课教员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讲“军事运动”；邓中夏讲“工人运动”；熊雄、阮啸仙讲“农民运动”；恽代英讲“青年运动”；蔡畅讲“妇女运动”等。赵琴仙参加了这个政训班，她是女同学中最年轻的一个，学习认真，不但在小组讨论会上积极发表意见，并主动找同学们讨论问题。她的生活勤俭朴实。她还爱帮助别的同学，很受同学们推崇。政训班为期虽然只有半年，但她学习了不少革命道理。由于革命的需要，1927年1月学习结束。根据周恩来指示，毕业的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杨青田负责组织宣传队，参加北伐，到南昌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任连党代表或政治指导员；一部分由王德三负责，带领回云南开展党的工作。

赵琴仙于1927年2月返抵昆明。经过在广州这段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武装了她的头脑，赵琴仙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吴澄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小学教师，而且成为一个充满热情的宣传鼓动家，成为革命青年的挚友和一位亲切的领导者。

三

赵琴仙从广州政治训练班学习回来，懂得了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必须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妇女运动是整

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她在女中附小二校教书的时候，在学校组织女教师参加妇女励进会，并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她曾介绍许多女教师和女中同学参加“青年努力会”，并在先进的同学和教师中介绍了徐克、李桂珍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业余时间，教战友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之歌》，鼓舞大家去战斗。为了与官僚军阀作斗争，她和吴澄组织小学教师酝酿讨论，由省教育会委员徐克在省教育会上提出并通过了这样的提案：一、严禁吸鸦片，贩卖鸦片；二、剿灭土匪；三、严惩贪官污吏；四、收回滇越铁路；五、增加小学教师工资。给依靠帝国主义、贩卖鸦片牟取暴利的军阀、官僚当头一棒。

当时国内正处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大好，而云南军阀唐继尧却提倡什么国家主义，高唱联省自治。党组织决定打倒唐继尧，搬掉民主革命道路上的这块绊脚石。这时，赵琴仙同吴澄、徐克等办起了《女声》杂志，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申诉不平，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但由于统治阶级的阻挠和刁难，加上经费、印刷、发行种种困难，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

赵琴仙除了白天在昆明市做妇运工作和进行革命宣传之外，每天晚上还到市西郊和船家青年、妇女们联系，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读书识字活动，建立了有几十人参加的识字班，一面扫盲，一面宣传革命道理，使这些船家也都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1927年2月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云南的革命潮流空前高涨。军阀唐继尧利用国家主义组织联省自治的破烂货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和党组织的宣传策

动下，云南胡（胡若愚）、龙（龙云）、张（张汝骥）、李（李选廷）四镇守使于2月6日联合倒唐。事变后四镇守使在宜良召集各团体代表开会。妇女界由妇女励进会、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会、女声社四个团体的八个代表参加，赵琴仙、吴澄等出席了会议。赵琴仙在会上明确地提出，妇女界希望彻底地打垮云南封建统治政权，不让唐继尧保留总裁高位，成立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新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学校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禁止蓄妾纳婢等。她的发言鲜明有力，使四镇守使感到震惊，到会的各校学生代表、群众团体代表深受鼓舞。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昆明市白天举行游行示威，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船家都走上街头，奋臂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争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洪流。当游行队伍走到华山西路时，恰巧遇到唐继尧坐着四人凸杆绿呢大轿从五华山返回他的私宅。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唐继尧”的口号。

当晚七时在国民党省议会召开“三八”妇女节晚会，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来参加。许多同志登台讲演，畅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此时由于坏人捣乱，电灯突然灭了。赵琴仙镇定若素，高喊：不要惊慌！不要走动！她边维持会场秩序，边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使晚会得以胜利地进行到底。不料第二天在昆明《西南日报》上，竟用特大字标题登出《灯熄裙破哭三八》的反动文章，肆意中伤和侮辱妇女。当时负责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宣传工作的赵琴仙，立即在女中图书馆召集各妇女组织的代表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她和徐克带着女工和女中、小学教师代表集队到武成路《西南日报》社质询，该社负责人沈某不敢出来回答。代表们怒不可遏，用木棒、砖头将报馆招牌砸烂，撕毁所印的报纸，扬长而去。此后，该报便再也不敢刊登侮辱妇女的文章。

1927年4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左派在兴隆街法政学校正式成立党部，赵琴仙负责妇女部的工作，工作严肃认真。那时广大的小学教师的工资不仅极为微薄，而且不能按月发给，经常要欠三个月，教师生活十分困难，加上政治上受反动当局督学的压迫，不堪忍受。为维护教师的切身利益，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赵琴仙在学校组织了教师索薪运动和反对督学制的斗争。学校的教师代表到省财政厅找到财政厅厅长陈鹤亭评理。赵琴仙义正词严地步步紧逼，直到陈答应解决后才离开。此后小学教师的工资才得以按月发给。后来教育联合会召开大会讨论督学制问题，昆明市的几个负责督学的头面人物也被邀来参加了。会上，教师们揭发了督学以视察教学为名，耀武扬威，吹毛求疵，不是实事求是地改进教学，而是帮助反动统治者压迫教师。平时压迫教师最凶狠的督学张笏，目瞪口呆，无话可说。这次会议，狠狠打击了平日凌驾于教师之上的“督学”的威风。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于同年8月派李宗黄来昆明笼络云南军阀。圆通派党部（云南国民党右派）开黑名单，竭力在昆明各学校破坏革命工作。地下党发动各群众团体，组织街头宣传队，展开了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赵琴仙同徐克、杨静珊、伏瑞珍等到昆明的大街小巷及南较场等地宣传，揭露右派的反革命行为，时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共青团员、成德中学学生梁元斌在武成路宣传时，被

李宗黄的手枪队追逐至小巷内枪杀。新上台的云南军阀被蒋介石收买，白色恐怖笼罩了云南。

四

1928年2月，阴历年前夕，赵琴仙被捕入狱。她在狱中被敌人拷打审问时，坚贞不屈。同年3月29日，她就义的前一天，还在帮同狱难友的小孩织毛衣。30日，一个阴暗的早晨，女管监来叫赵琴仙出去，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仍面不改色，一如既往。连国民党典狱长都说：“想不到这小小年纪的姑娘，会如此坚强。”当她被押往刑场时，戴着沉重的脚镣，沿路高呼：“我参加革命，没有罪恶。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她竭尽全力地时而高声控诉，时而高喊口号。路过书林街时，适逢她在女中附小的学生张煜上街打水，孩子看到她敬爱的老师这个样子，忍不住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路跟在她后面哭喊，一直送她到小西门地台刑场。张煜扑上去拉着她敬爱的老师，赵琴仙同志发现是自己的学生，安慰孩子说：“不要哭，快回家去吧！我不会死。”话刚说完，刽子手就把张煜拖到一旁。赵琴仙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无情的枪声，她倒卧在地。这位云南妇女运动的前驱，为壮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她的青春和生命。

（吴显明整理）

赵 祚 传

赵祚传，字统一，1903年10月10日（阴历8月20日）出生于云南省大姚县七街仓西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云南省临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牺牲于大姚。

—

赵祚传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的大家庭，祖父是清朝的进士，父亲是清末的举人。赵祚传八岁开蒙读书，因他从小身体瘦弱，心疼孩子的母亲每天只让他认二个字，十岁才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1914年，父亲到昆明省立工业学校任教，赵祚传随父到昆明，先后在东区和西区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因祖父生病，他又与哥哥一起回家，一面侍奉老人，一面在大姚七街忠孝寺高级小学读书。1918年，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一中。

赵祚传的生活很俭朴，虽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但他仍很注意节约。他说：“衣以蔽体，食以养生，粗布衣服比绸缎实惠得多，不要不讲实效而尚华丽。饮食要多食蔬菜对身体才有好处。”每年放寒假，他回家过春节都与其他同学一道坚持步行。当时交通不便，由大姚到昆明往返一次，步行需十六天，母亲要他雇马代步，他执意不从，他说每天走几十里路，对身体有益无害。他自己很节俭，对别人却从来